

正在消逝的美国老式理发店

◆ 编译 李颖浩

美国传奇的泳坛巨星菲尔普斯在里约奥运会上六度登上领奖台，镜头中的菲尔普斯留着一头短直休闲的发型。这是飞赴里约前夕，他在亚特兰大的一家理发店(barbershop)剪的。当时菲尔普斯将自己和理发师及顾客们的合照上传到 Instagram，结果引发了一阵轰动。粉丝热情点赞留言并非仅出于简单的明星效应，这个情节的发生有一个特殊的背景：曾经流行美国的理发店如今已经逐渐衰落。

二十年减少23%

红白蓝螺旋条纹灯箱、黑色皮质座椅和长直的刮胡刀是美国理发店的“标配”。在美国，与男女顾客皆服务的美发沙龙(hair salon)不同，理发店(barbershop)一般只给男士提供理发和剃须服务，且理发以短发见长，发型相对简单及单一。理发店的功能也超出中国人对一般理发店的认识，它还具有社交功能。男顾客之间，顾客与理发师之间存在社交传统，在这个“远离女性”的空间，他们会聊生活，聊政治，甚至下棋。很多人来理发店不是因为头发太长了，而是想来聊聊天。

理发店在美国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但如今却有越来越多的理发店关张。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公布的数据，从 1992 年到 2012 年这 20 年间，美国理发店的数量下降了 23%。

男士沙龙与专业形象

理发店关门的同时，男士沙龙(men’s salon)却在全美各地崛起。它们为男士提供更高端的服务，包括热敷面部护理和手部护理(修指甲的委婉说法)。这里的花销要比理发店和一般的美发连锁店贵，里面的装修时尚现代，并不是那种人们可以随便闲逛的地方，不利于发展社交。

美国南伊利诺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克里斯汀·巴伯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在她的研究中，男士沙龙的发型师们将理发店描述为一个正在消逝的场所，称男人们正在寻求更加

尊贵的美发体验，而这是电视积灰、地板油腻，只有一摞擦汽车杂志的理发店所不能提供的。

男士沙龙新进的年轻理发师们似乎也不再留恋老式的理发店，他们把新兴的男士沙龙视为“男士专属场所”的一种“革新”，认为它比“又小又脏”的理发店“更为顾客着想”。而那些还在坚持的理发店也开始尝试让自己变得稍微高端点，比如重新刷个墙或者置些平板电视。

巴伯采访了一些男士沙龙的顾客，问他们是否在理发店理过发，他们回答说自己根本不属于理发店的受众市场。在他们看来，理发店是为没多少头发需要打样的老男人和不怎么在乎形象的小男生服务的。而作为职业的白领男士，他们普遍认为自己已经过了光顾理发店的年纪。

确实，相比理发店，男士沙龙不仅理发更加精细，还提供染发、修指(趾)甲和脱毛等服务，帮助这些男士获得他们希望的“专业的”外型。一名叫吉尔的顾客解释说：“职业的、商务的男性都知道，如果他们外表看起来像成功人士，就会给他们的客户、顾客或其他一起工作的人留下一种印象——这个人是聪明的，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仍受一些人欢迎

然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理发店的地位依然重要。

事实上，光顾男士沙龙的多是相对富裕的白人，他们提供的看法是片面的，有些甚至是带有偏见的。如一位在女士沙龙(women’s salon)消费的外顾客表示，去理发店理发的都是不太在乎外型的技师或修理工，要么就是很喜欢看店里《花花公子》的大男子主义者。

美国的理发店从 19 世纪以来，直到今天，都有明显的顾客种族区分——分为非洲裔顾客为主的及白人顾客为主的。20 世纪 90 年代“都市型男”风潮渐起，富有男士开始抛



弃理发店，转进美发沙龙。汇入这股潮流的大多是白人，但有研究表明，理发店在注重兄弟情义的非洲裔社区依然受到欢迎，非洲裔街区存在着很多街角理发店。

美国政治学家和电视节目主持人梅利莎·佩里在她的著作《理发店、圣经、非洲裔娱乐电视台》中阐述了理发店里的对话是如何影响非洲裔人政治思想的塑造的，并认为理发店维系着非洲裔社区的关系，尤其对于年轻非洲裔来说，理发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交场所。

这也是菲尔普斯到亚特兰大理发店理发引发巨大轰动的一个原因。在菲尔普斯上传的合照中，是一个典型的旧式理发店场景，除了菲尔普斯，其他十余位顾客及理发师几乎都是非洲裔。菲尔普斯是在一名教练的推荐下去“尝鲜”的。网友们纷纷为菲尔普斯光顾“非高端化”的理发店点赞，而这家长复古的理发店也因此难得迎来了一阵火爆的生意。

理发店里的男子气概

作为“没有女性的世界”，理发店一直以来就洋溢着阳刚之气。但在如今这个年代，男子气概的定义已经发生变化，传统意义上的

傅海澜传

董煜



4.遇到两位“贵人”

那时，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布道异军突起，成效惊人，教士、教徒数目激增，遍及各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傅瑞卿也信上了基督教。在傅泾波少年时，傅瑞卿便将长子送进了美国教会办的北京汇文中学。

傅泾波在汇文中学就读期间遇到过两位“贵人”，这两位“贵人”对他今后的性格形成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一位是孙洪伊。孙洪伊家原是天津北仓当地的望族，家境殷实，有万亩良田，可是八国联军入侵时，北仓遭到劫难，孙洪伊家产损失惨重，弟弟也被法国民兵的枪弹击中不治而亡，这让孙洪伊看到了清朝的积弱和腐败，萌生了开启民智、教育救国的念头，于是变卖家产、捐资办学，先后兴办了普育女学、民新学堂、四成小学、北仓小学、电报学校、河东中学等，是当地教育发展的有功之人。孙洪伊乃早期的同盟会会员，以后，他又加入了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任内务总长。民国初期政坛上有著名的南北二孙，大孙乃民国缔造者孙中山，小孙就是孙洪伊。

当时，直隶省咨议局设在天津，傅瑞卿经常要去天津办公。因为直隶省咨议局的议长孙洪伊跟傅瑞卿是世交，所以有一次去天津时，傅瑞卿便把傅泾波也带去了。

孙洪伊留着一脸的大胡子，神采奕奕，傅泾波喊了声世伯，便坐在一旁听父亲和世伯说话。孙洪伊向来以雄辩著称，且说到国家民族之大事，口若悬河，慷慨激昂，一下就打动了傅泾波，临走，傅瑞卿把儿子拉到好友面前，郑重其事地拜托好友教导、关照自己的儿子，并且以后只要一去天津公干，总把儿子带去拜见孙洪伊。

傅泾波聪明机智，又有很好的国学根底，孙洪伊很愿意指点这个小世侄，所以将自己一身本事悉数传授，傅泾波也对这位前辈极其尊重，称他为“我的教父”，在孙洪伊的指点下，傅泾波练就了一手好文章，特别是官场文

书、往来公文，几乎都是一挥而就，并在政治上早早地受到点拨和熏陶，迅速成熟起来。

另一位则是蔡廷幹。蔡廷幹乃清政府派赴美国的百名幼童留学生之一，在长达 8 年的美国生活中，他和多数的留美幼童一样，在西式教育的影响下，对中国固有的封建礼教和社会伦理观念有所抵制，成为几名首先剪掉辮子的学生之一。奉调回国后曾在北洋水师任职，亲历甲午海战，以后又任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蔡廷幹为官清廉、刚正不阿，曾有“先做人，再做事，次做官。官可以不做，事不可不做，事可以不做，人不能不做”的名言传世。蔡廷幹英语极好，他曾选取唐宋诗 122 首译成英文，出版了《唐诗英韵》，是华人中系统英译汉诗的第一人。其他未成书的还有英译本《阅微草堂笔记》《红楼梦选篇》等。因为他的文事武功均有卓越成就，故被当年上流社会冠以“儒将”之称。

傅瑞卿钦佩蔡廷幹的学识和为人，希望蔡廷幹能多多提携培养自己的长子，正好蔡廷幹需要一个帮手，也欣赏世侄娴熟的国文根底，所以便请傅泾波帮助自己处理中文信件。为了帮助傅泾波提高英语水平，蔡廷幹一直用英语跟傅泾波对话，不久，傅泾波便熟练地掌握了这门外语，能用英语自如地跟对方交流。每天课余时间，傅泾波都会去蔡廷幹处工作两小时，用赚来的钱贴补家用。闲来，蔡廷幹会跟傅泾波说起当初甲午海战的很多细节。

那时，蔡廷幹任管带的小鱼雷艇“福龙”号只有 115 吨，但是面对强大的日本海军舰队，蔡廷幹和弟兄们毫不畏惧，他们把日方最弱的一艘军舰“西京丸”从舰队编队中分割开来，驾驶“福龙”号冲向“西京丸”。当逼近敌舰时，“福龙号”连发两枚鱼雷，但都被“西京丸”号转舵避开。“福龙”号立即听回右转，当抵近至“西京丸”左舷仅 40 米处，又发射一枚鱼雷。根据当时在舰桥上观战的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中将的《回忆录》中描述：“目睹此情，本舰已无法躲避，我也只好闭目待毙。”谁知由于中国的鱼雷生产厂对鱼雷定深有误，鱼雷竟然从舰底穿过，当蔡廷幹再下令发射鱼雷时，无奈艇上装备的三枚鱼雷已经全部用完，只好全速退出战斗。返航途中，“福龙”号还救起了不少坠海漂浮的海军战士……

22.到亭子间捉“特务”

弄堂里只有住在四十三号亭子间的男人算有点腔调，不过他难得到古井边上来，来了也只是在外围听听，然后不屑地笑着离开。一年到头，亭子间的窗帘布从来没有拉开过。那家伙戴顶鸭舌帽，手里拎只皮包，走进走出不看人不打招呼的，独来独往，面无表情，显得深不可测。走出弄堂他还经常回头看，装出一副神出鬼没的样子，好像有人在盯他的梢。我猜想，他很有可能是个特务。有次居民小组长孙大姐上门收清洁费，那家伙只开了一条门缝，伸出了一只毛茸茸的手把钞票塞出来，孙大姐差点魂灵也被他吓出来。孙大姐警惕性高，就开始怀疑了，每天夜里赤了脚摸上去，贴了门缝听，听了几天，没有听出什么名堂。

有天夜里，孙大姐一觉睡醒，突然福至心灵，心想特务一般都是半夜里活动的，当即棉袄一披，又赤了脚摸上去。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下被她抓住把柄了。只听到房间里在调电台，还有说话的声音，还有干扰声。孙大姐开心啊，想这记事情搞大了，当场去敲居委会主任杨招珍的门。杨招珍看到孙大姐半夜三更披头散发过来，而且表情十分狰狞，嘴巴里一边还在喊：捉牢了，捉牢了。杨招珍以为出大事体了，吓得脚也发软了。得知详情，杨招珍也不敢怠慢，叮嘱孙大姐回去继续监视，自己三步并两步到派出所去报告。

派出所值班的同志十分重视，明天就是元旦，上级指示要加强保卫工作，不能出丝毫差错。两个民警由杨招珍带路，一路小跑跑到四十三号，先轻手轻脚上去，到了亭子间门口就砰砰砰敲门，敲得很响。门一敲，前后左右人家的灯全部亮了。亭子间的男人穿了短裤棉毛衫来开门，看到警察居然一点不慌，门开好，又钻进被头窝，说：“做啥？来捉人还是吓人啊？”无线电里正在唱歌，《社员都是向阳花》。年长一点的民警朝床底下看了看，空的，判断这么短的时间不可能把发报机转移，也不可能大冷天穿着短裤棉毛衫发报；再看看那只无线电，很老式的那种，没有短波，收听不到敌台的。年长的民警笑着开国语：“同志，不好意思打扰了。为什么这么晚还不休息？”

亭子间的男人举头偻脑地说：“我失眠可以吧？安眠药吃光了，夜里睡不着，我听听无线电可以吧？”年长的民警笑着说：“听居民反映，你好像有那么点神秘。”亭子间男人喉咙更加响：“我生性孤僻可以吧？我不喜欢跟人打招呼可以吧？你去调查好了，我三代贫农，十二岁到上海学生意，一直在淮海路国营旧货商店，我是估价员。淮国旧听到过吧？”两个

民警连连打招呼说对不起。杨招珍也打招呼说对不起。几个人退出去，随手关好门。

第二天晚上，那个年长的民警李同志又来四十三号了。李同志再次向亭子间男人赔礼道歉，表示居委会会采取一定的方式消除不好的影响，请他放心。临走的时候，李同志摸出一块旧手表，请亭子间男人估估价钱。

居民小组长孙大姐从此以后人就像瘪脱了，没精打采，过了几天就向居委会辞职了，不做小组长了，说脚底受了冷，生关节炎了，走不动了。

到了年底，亭子间男人被评为“五好家庭”，亭子间门口贴了张“五好家庭”的烫金红纸。那一年在上海，单身男人被评为五好家庭的，大概独此一家。

整个同和里，真正名气响点的，要算阿陆头了。阿陆头就住在古井旁边，样样都懂。古井边要是发生争执，就有人说，去喊阿陆头来。阿陆头来了，说谁赢就是谁赢，说什么就是什么，一言九鼎。不过阿陆头经常出差不在家。

接下来，名气稍微响点的，要算长脚女人和她的长脚老公。长脚女人就住在后弄堂的过街楼上面。长脚女人经常去布店，经常到楼下裁缝摊做衣裳，新衣裳一套又一套，人太瘦了，衣裳穿在身上撑不起来，晃荡晃荡，没有什么样子。长脚女人还是买，还是做，还到上海滩最高级的南京理发厅去烫头发。弄堂里的女人眼睛红得几乎要滴出血来。夫妻俩不过是在小菜场里做的，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有这么多钞票。直到有一天，长脚女人的老公被捉出来了，才知道他们家的钞票哪里来的。

同和里



王承志